

北宋中期儒学复兴运动

导师：徐中舒 吴天墀 撰者：刘复生

一、儒学复兴运动的产生及其特点

经历长期混乱建立起来的赵宋王朝，在政治方面厉行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，同时广泛收罗社会人才，以扩大统治基础；在意识形态方面，提倡儒、释、道“三教”合一，借以稳固封建秩序。但宋王朝并不能克服封建社会的各种固有矛盾。面对着剧烈的社会变革，统治者除了在政策和制度上作某些调整而外，迫切需要有一种解救社会危机、维系封建秩序的新的思想武器。经过长期的探索，终于“找到”了这条道路，这就是：复兴儒学、更新儒学。

始于中唐而勃兴于北宋时期的儒学复兴运动以怀疑传统经学为起点，终于汇成了强大的潮流，成为中国历史上特别是学术思想史上的重大事件。唐初官方撰定《五经正义》，“士子皆谨守官书，莫敢异议”。到了中唐，政治上的危机日渐暴露，笃守义疏的经学传统也被打开了很大缺口。啖助治《春秋》，“摭述三家，不本所承”，成为经学史上的一个分水岭。此前，“学者皆专门名家，苟有不通，宁言经误”；此后，“学者喜援经击传，其或未明，则凭私臆决”。到宋初，传统经学“已陵夷衰微矣。然笃守古义，无取新奇，各承师传，不凭胸臆，犹汉唐注疏之遗

也”。虽有如柳开等人“不看注与疏”，但直到仁宗时期，风气才发生了根本变化。固守义疏章句约束了人们的思想，打破僵化的经学传统，成为复兴儒学的迫切任务。直抒胸意，发明经旨，在北宋中期汇成为洪流一发而不可止，这便是今人所称的疑经思潮。在这场思想运动中，最有影响的代表人物有孙复、欧阳修、刘敞、王安石等人。

庆历前后，儒学复兴运动形成高潮，出现“学统四起”的盛况，一批批新儒相因而起，左提右挈，声势浩大，影响所及，包括思想学术以及文学、史学、政治、教育、科举等各个领域，范围之广、规模之巨、时间之长、影响之深，则远非中唐的儒学运动所能比拟。它的特色为：第一，坚持儒家道统，作为抬高儒学地位，并与各种“异端邪说”相抗争的旗帜。第二，把握儒家精神，宏扬“经旨”。即阐明儒学“大义”、“义理”，不再拘守汉唐章句注疏的旧学。第三，提倡经世致用，主张以儒经义理为指导，以“治国治民”为目标。这些特点，其目的在于改造社会现实，达成“先王之治”的理想。因此，北宋中期的儒学复兴运动，具有针对现实的浓郁批判精神。

二、反佛老思潮的蓬勃兴起

佛教传入中国后，几经兴衰，至唐代而大盛。道教之于李唐，也深受尊崇。五代周世宗灭佛，佛教势力受到打击，道教在长期的战乱中也被削弱。宋初统治者提倡儒、释、道“三教”并重，佛道二教因此有了长足的发展。特别是真宗一朝，佛道势力甚为兴盛。

唐代对佛道二教持否定态度者颇不乏人。至北宋，柳开、王禹偁、孙奭都站在儒家立场上立言，以儒老为异端。宋仁宗即位后，抨斥佛老的呼声再度兴起。对佛老的批判大体可以分为外在的和内在的两种类型。在宋仁宗时期，前者成为主要的批判形

式，其内容主要有五：第一，以儒家道统对抗佛道二教。第二，以实现儒家仁义礼乐之“治平”理想的人世抱负来批判佛老自谋身利、逃避现实的出世思想。第三，揭露佛道二教流行对社会经济生活造成的巨大损害。第四，援引历史事实作为借鉴，证明信奉神佛毫无效用。强调“贵中华而贱夷狄”，以维护儒家文化的权威性。当时，复兴儒学，排斥佛老“异端”已成为朝野士大夫的自觉和共识，朝廷对佛道二教采取了一些限制措施。僧道势力自真宗之后直到神宗元丰时期一直处于下降趋势。这不是偶然的，实与儒学复兴思潮大有关系。

宋代理学家同时还吸收改造释道哲理，进行内在的批判。张载著《正蒙》，针对释老，申明“大道精微之理”，为儒学的再创新荆开道。佛老否定现实生活，追求“无生”、“长生”，悬想“彼岸”幸福，在张载看来是很虚妄的，他的《易说》论证了“天人合一”的主旨，批驳了佛老的“天人二本”论。张载以“气”为宇宙本原，衍化万物，与佛老所持唯心论相对立。二程认为“佛老之害甚于杨墨”，佛教之害尤为严重，其驳斥佛氏的论点大要有二：一是毁弃人伦的“出世”说，二是畏怖生死的“轮回”说。二程肯定现实生活中封建社会秩序符合“天理”。驳斥佛氏“毁人伦，去四大”，指斥佛氏的出世说是率人走向“绝类”的境地。排斥佛老“异端”是复兴儒学的需要，正如程颢所说：“道之不明。异端害之也。……辟之而后可以入道。”

三、古文运动与儒学思潮

古文运动与儒学复兴思潮关系至为密切。从韩愈到欧阳修，古文运动实际上成为新儒学运动的组成部分。韩愈说：“通其辞者，本志乎古道者也。”说明古文运动的目的在于兴复“古道”即儒家之道的。

古文运动不仅是新旧文体的交替，而且它是儒学复兴思潮在

文学上的体现。范仲淹说，到欧阳修，天下之文一变，“其深有功于道”；曾巩自白，他“努力文字间”乃是基于“扶衰救缺之心”，都说明了这点。文道关系这个古代文论讨论的中心话题，在北宋古文运动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现，而这正是儒家文学观的核心。

柳开最早对“古文”的定义作出解释，说：“古其理，高其意，随言短长，应变作制，同古人之行事，是谓之古文。”主张文道合一。智圆提出：“今其辞而宗于儒，谓之古文可也”，反之则不可。古文成了儒家之道的同义语。其后孙复、刘敞、陈襄等人之论文道，大体都未越出这两种论点。欧阳修同样主张以“道”为中心，他说：“我所谓文，必与道俱”，提倡“知古明道”。曾巩、司马光、王安石等无一不是如此。

周敦颐在《通书》中提出“文以载道”。他说：“文辞，艺也；道德，实也。笃其实，而艺者书之，美则爱，爱则传焉。”借文以传道，重道轻文但不废文，是古文运动中的普遍看法。梅尧臣《答三韩见赠述诗》、石介《怪说》、欧阳修《送徐无党南归序》等都是同样抨击离道之“艺”的。尽管他们在对“道”或“文”的具体认识上存在着很大差别，但其核心观念却是倾向一致的。

四、史学发展与儒学思潮

唐初修史，以“取鉴”为其要务，但在思想上“通众家之意”，多不独尊儒学。五代宋初所修《旧唐书》和《旧五代史》，但以纂辑史料为能事，同样没有把儒家思想作为评判是非得失的唯一标准。北宋中叶，儒学复兴思潮流行，史学受到了很大的影响。一些史家认为，不应该把历史当作是史料或史事的单纯记载，而应该通过史实来考察、揭示其治乱兴衰的轨迹，儒家思想是评判是非得失的最高标准。这种看法早在中唐已经出现，到北

宋中叶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。孙甫认为为史之道在于“明治乱之本，谨戒劝之道”。曾巩说：“史者，所以明夫治天下之道也”，以儒家“先王之道”为“天下之通道”。司马光更明白地说：史学乃“儒之一端”。

作为儒学思潮影响史学的一个侧影，“正统”之辨在北宋中叶热闹起来。唐代已有人对“正统”问题提出了新的见解，如皇甫湜发挥《春秋公羊传》“大一统”说。这种观点为欧阳修继承并进一步加以阐发，著《正统论》，把“正统”之辨推向高潮。欧阳修驳斥了此前的两种正统论调，其一驳分裂时期的“偏名一德”，其二即驳“五胜之术”。认为它们“挟自私之心而溺于非圣之学”。当时尹洙、章望之、苏轼、司马光和南宋朱熹等都纷纷就“正统”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。

唐史、五代史的改撰明显地表现了史风转变和时代烙印，《新唐书》和《新五代史》是改撰热潮中的两部重要成果。两部旧史并非不言取鉴，然而受到责难，是因为史家已有了新的观念并树立起了新的评史标准。

孙甫仿《春秋》，修成《唐史记》。司马光编年巨著《资治通鉴》不取《春秋》褒贬笔法，不敢正闰之说，但它同样深刻地反映了儒学思潮的强烈影响。他以三代王道政治为高，表现了儒家思想影响下的历史哲学。重建儒家的纲常伦理和礼乐教化的制度，是其“资治”的主旨所在。范祖禹在参与《通鉴》的修撰中，“稽其成败之迹，折以义理”，缉成《唐鉴》，借史发议论。这三部书都以史明儒家之道是要，而《唐鉴》之作还表明史学的理学化并使之成为理学的注脚。

五、儒学思潮影响下的兴学与贡举

唐末五代，学校废弛。宋初，除中央有国子监收容少量“国子”而外，未建立正式学校，地方上仅有极少数学校存在，但也

有名无实。在官学缺废的情况下，地方上便出现了私学。私学发展的重要形式是书院的成立。名闻后世的北宋四大书院或六大书院，都创立于唐末至宋初这段时间。私学是“贤士大夫留意斯文者所建”，传习儒学以期其振兴，以裨补和维护封建统治秩序为目的。私学的发展造就了大批知识分子。北宋前期科举取士的扩大为儒生们提供了政治出路，为数众多的具有儒家思想的知识分子走上了仕途，又促进了儒家教育事业的更大发展。但这个发展不是私学走向繁荣，而是私学向官学转变，这是“留意斯文”且在朝的“贤者”借助封建国家的力量而进行的。

“范仲淹等意欲复古劝学，数言兴学校，本行实。”宋祁、欧阳修等九人合奏建议采纳。庆历四年(1044)三月，朝廷正式下达了兴学诏令，要求在境内普遍置学，同时规定了选派教师的条件和参加科试所必须学习的日限。于是，“人争务学，风格一变”。

嘉祐以来，州郡学校的弊端日渐暴露。刘敞、欧阳修、王安石、司马光等，纷纷要求整顿学校、改革教育制度以及与之相联的取士之法。被称为北宋第二次兴学的熙宁元丰变法时期的学制改革，正是在这种日渐强烈的共同呼声的基础上进行的。它包括对地方学校的加强和对太学的改造。

北宋学校发展的轨迹与儒学思潮的发展默契配合，事实上，前者本身就是后者的一种表现形式。首先值得注意的是兴学热潮中表现出来的“复古”倾向，兴学运动的倡导者希望按三代的理想蓝图恢复学校教育。第二，针对唐代后期出现的“学废庙存”状况，要求祀孔应与儒家学校教育相配合。第三，高度重视太学的教化作用，认为这是恢复三代之治的首要条件。第四，提倡儒家“师道”是兴学运动中的一个显著特点。第五，兴办传播儒家义理的学校以对抗佛老“异端”，乃为宋儒的共同呼声。第六，提倡“明体达用”之学，以儒家义理为指导，达成修、齐、治、平之业。第七，改变“风俗之弊、人材之乏”是兴学运动追求的

目标。第八，古代“乡举里选”和“士由学校”的教育制度被认作是培养人材、转移世风的有力手段。

北宋前期的贡举取士较前代有了一个大的发展，但“以帖经墨义试诸科、以诗赋取进士”的考试方法却一仍其旧。仁宗即位以来，要求改革取士制度的呼声日渐高涨。朝廷对考试内容和方法逐渐作了一些调整，“策论”、“经义”和“德行”开始受到了重视。这种变化，是与新儒学兴起的时风紧密配合的。李淑、富弼、欧阳修、贾昌朝等都纷纷上奏陈言科举改革。酝酿了数十年而日趋热烈的呼声，终于在庆历新政期间得到了落实或解决。范仲淹提出了“精贡举”的改革办法，要求讲求“履行”、重策论而轻诗赋，重“经旨”而轻“墨义”。这次贡举改革未能实施便随着新政的失败而破产，但它毕竟对流行三四百年的科场旧规以猛烈的冲击。庆历之后，要求改革的呼声并未衰息。程颐、王安石、司马光等都上言议贡举改革，表现了时人的共同要求。朝廷也新定了考试标准，以阐明儒经“大义”比诵记“注疏”为优，又别置明经科。熙宁变法，贡举改革也进入了决定性阶段。熙宁四年颁布了贡举新制。北宋中期贡举改革的主要内容，反映了思想潮流的深刻变化。其发展脉络主要有三：第一，从以诗赋定去留到罢诗赋，代之以策论。第二，从以帖经墨义定去留到罢帖经墨义，代之以经义，要求务通义理，不须尽用注疏。第三，从先“文学”后德行到先德行而后“文学”。王安石的贡举改革得到大多数人的赞同，即使其政敌司马光也认为此举“乃革历代之积弊，复先王之令典，百世不易之法”。所反对者，止在于“王安石不当以一家私学欲掩先儒”。这反映了儒学复兴运动中共同的内在要求。

北宋再度兴起的儒学复兴运动向前发展便产生了理学。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探寻理学的发展脉络，撰《伊洛渊源录》，于北

宋列入周敦颐、程颢、程颐、张载、邵雍五人，即所谓“北宋五子”。但是，以周敦颐作为道学的首创者，乃是朱熹为建立其“道统”的构思，“并不真正符合历史和思想史的真实。”理学在它的萌发阶段，既未形成统一的学派，在当时也未发生多大的影响。五子之间，有互相联系的一面，也各有特色而自成学派。北宋五子自成门户的状态反映了儒学复兴时期百家争鸣的景象。他们重在儒学的再创，其活动多在仁宗末年至神宗时期。其重要代表人物程颐更在其后。朱熹创造了伊洛“渊源”系统，排除门户之见而集众家之大成，融汇贯通，正是他高出于他以前的理学家的地方。

洛学门人独尊二程，以为得孔孟真传。周、张等人不得与之并，对此前的儒学活动更是闭目不顾。此实为自大其门之偏见。其实二程治学，是善于吸取他人的有用成果的。例如对王弼、胡瑗、王安石三家之《易》，程颐即甚表欣赏。对中唐以来的新儒学也给予了较高评价。前人对程氏所起的开启作用，十分明显。

朱熹对濂洛之前或同时代的儒学活动采取了比较客观的态度，他说：“理义大本复明于世固自周、程，然先此诸儒亦多有助。”还说本朝“道学之盛”，“亦有其渐”。可见朱熹认为，理学思想的产生是有一个渐进过程的。朱熹列“庆历三先生”为周、程、张诸子所谓“道学”先驱，但认为他们说“理”未透。朱熹还指出，宋初以来就已有了复兴儒学的活动，列“儒学”诸人，囊括一时学者，包括欧阳修、王安石、苏氏父子、胡瑗、孙复、二程等，他们的观点并不完全相同。这实际上是承认二程仅“儒学”派别中的一家，是比较客观的。

理学诸子既发轫于儒学复兴思潮，但他们与其他新儒相比，除了共同点外，又有所区别。若以《汉书》给儒家所下的定义而言，北宋中期除理学家而外的新儒们看来更接近先秦儒家。新儒们屏弃汉唐以来流行的训诂章句之学，主张直探圣经贤传的本旨精义，为解救当代社会危机而遵循儒学的精神采取对策。于是

《汉书》给先秦儒家所总结的特点：“祖述尧舜、宪章文武”，“助人君顺阴阳、明教化”，这个界说也就颇合于北宋中期新儒们的思想实质了。

若以“内圣外王”来评析宋学精神，那么北宋中期的新儒，其所致力更多地表现在“外王”方面。而从儒学复兴思潮中继起的理学家，首先注意的却是“内圣”功夫。张、程诸子强调“性与天道”问题的重要性，认为“性与天道”都贯穿着“理”和统一于“理”。故而理学家们特别注重“养性”，以完成最高人格修养，从而与“天理”之所规范相符合。或把理学称为“新儒中的新儒”，是很有道理的。其更“新”之处，在于把心性修养看作是头等重要之事。同时认为，必有“内圣”之功乃有“外王”之业，主张在“身上做工夫”，由“内圣”以达“外王”。这样就把“心性”问题和所谓“王道政治”结合起来了。所以理学家把“格、致、正、诚、修、齐、治、平”的“八条目”工夫，看作是连贯的统一体。“物有本末，事有终始，知所先后，则近道矣。”

作者工作单位：四川大学历史系

韩邦靖生于明弘治元年

冯宝琳《正德朝邑县志的版本问题》（刊《文献》1989年第2期）说：韩邦靖弘治二年生，嘉靖二年卒（1489—1523），年仅三十五岁。

韩邦靖的生年不是弘治二年，而是弘治元年戊申（1488）；享年不是三十五，而是三十六。焦竑《献征录》卷97《韩邦靖墓志铭》（王九思撰）云：韩邦靖弘治戊申（1488）生，嘉靖癸未（1523）卒，年三十六。钱谦益《列朝诗集小传·韩参议邦靖》亦云：韩邦靖年二十一，举正德三年进士（按，据此逆推，韩的生年是弘治元年），嘉靖二年，年三十六卒。

• 官大樑 •